



从三星堆文化看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早期历程

□ 吴超明

1986年，三星堆遗址1、2号祭祀坑出土了造型奇异的青铜器、风格独特的金器、精美绝伦的玉器以及十分珍稀的象牙等文物，展现出三星堆文化的独特审美、高超技术与神秘仪式，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三星堆与蜀文化的研究热潮。三星堆文化从夏代晚期延续至商末周初，以成都平原为核心分布区，地处中原与西南夷地区之间，还是中原青铜文明向西南传播的前沿阵地和关键纽带，体现出夏商文化、蜀文化和西南夷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为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历程提供了重要视角。

因夏而生

进入青铜时代以前，成都平原广泛分布着以宝墩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出现了以宝墩古城为代表的史前城址群，为三星堆文化的诞生提供了优渥土壤。

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是东亚的中心文化，也是中国早期国家初步发展阶段的重要代表。夏代晚期，夏文化进入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进而沿长江上游水道西进至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的封口壶、敞口觚、高柄豆等日用陶器在夏文化中都可以找到原型。夏文化的玉璋、玉戈、绿松石铜牌、单翼铜铃等也被三星堆文化吸收，成为重要的祭祀用品。总之，夏文化的传入打破了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格局，三星堆文化在文化交融的背景中形成，夏文化因子也成为三星堆文化中长期留传、不断发展的新要素。据此有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形成可能与夏代移民的南迁有关。

商代晚期，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商文化的联系更加紧密，这种关系集中反映在铜器上。从形态上看，三星堆圆尊的造型与中原二里岗、殷墟的圆尊接近。兽面纹尊的造型与殷墟二期的大口尊接近，而兽面纹的一些细节特征与湖南出

土的同类器相似。龙虎尊与安徽阜南出土的同类器几乎一致。罍的造型与殷墟出土的同类器接近，但有些罍体形高大、高足直立的形态特征和兽面纹、凤鸟纹的纹饰特征又与湖南岳阳出土的同类器相似。可见，这些铜器与黄河中下游、长江中游、淮河中上游等地的商文化关系密切。从技术上看，无论是尊、罍等来自商文化的铜器，还是立人、面具、头像、神树等极具古蜀特色的铜器，它们的合金配比都以锡青铜、锡铅青铜为主，铅青铜为辅，属于中原商文化的合金体系。更为重要的是，三星堆文化铜器的范铸成型技术与中原一致，铸造使用的泥范又与长江中游接近，这说明三星堆文化铜器制造业的兴起应该是中原商文化青铜铸造技术进入长江中游后向长江上游传播的结果。总之，在商文化的影响下，三星堆文化的生产力迅速提升，制造了大量造型独特的铜器、玉器、金器等古蜀重器，修建了面积约3.6平方千米的巍峨古城。此时的蜀文化已经是十分成熟的青铜文明，具备了将原始信仰作为精神纽带来行使统治权力的古国形态。

向夷而兴

商代末期至西周早期，长期的发展和巴人的涌入导致成都平原的人口数量大幅增长，三星堆文化的都邑也由三星堆古城迁移至金沙遗址。金沙遗址面积约5平方千米，出土了大量与三星堆相似的金器、玉器、象牙等祭祀用品。成都平原以金沙遗址这一新都邑作为中心聚落，形成了众星拱月的聚落布局。在金沙遗址西北面约20千米的郫都区有一处波罗村遗址，这个遗址面积30余万平方米，是拱卫金沙遗址、管理一般聚落的次级中心聚落。在中心和次级中心聚落的周围，涌现出大量面积小于10万平方米的一般聚落，形成了多等级的金字塔式聚落结构。同时，陶器制造业得到了长足发展。金沙遗址修建了

160余座陶窑，是四川盆地最大的陶器制造中心，次级中心聚落与部分一般聚落也修建了小型陶器作坊，完全能够满足成都平原日用陶器的供应。可见，三星堆文化迁徙都邑后，并没有继续在营建城墙、制造大型青铜器等显示贵族身份的社会生产活动中投入大量资源，而是快速推进中小型聚落营建、陶器制造等与普通居民生计关系密切的生产活动。这是三星堆文化合理调配资源、稳定社会局面的重要举措，标志着古蜀国进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随着成都平原内部日益繁荣，三星堆文化迅速对西南夷地区产生较深的文化影响。

三星堆文化向西南进入青衣江中上游（今四川省西南部雅安市雨城区、眉山市洪雅县一带），翻越大相岭后进入大渡河中游（今四川省西南部雅安市汉源县一带），向南沿青衣江、岷江进入长江上游、金沙江下游的交界区域（今四川省南部宜宾市屏山县一带），向东南沿长江上游东进，再南下进入乌江下游（今重庆市东南部酉阳县一带）。三星堆文化扩散覆盖至这些地区，涌现出一批扼守古蜀南界的聚落。这使得西南夷的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转折，前述西南夷地区进入了三星堆青铜文明。三星堆文化将这些新兴聚落作为战略据点，继续向西南传播至安宁河谷（今四川省西南部凉山州一带）、滇东黔西地区（今云南省东北部昭通市巧家县、贵州省西北部毕节市威宁县一带），向南传播至赤水沟通黔北（今贵州省北部遵义市习水县一带），向东南传播至黔东南（今贵州省东部铜仁市碧江区一带）、湘西地区（今湖南省西部怀化市芷江县一带）。这些地区保留了当地的文化传统，但与古蜀国保持着通畅的文化商贸往来。此外，三星堆文化中极具夏文化



从考古看文明

多语种历史文献:北疆文化研究的珍贵史料

□ 双 宝

北疆文化作为发轫于我国北部边疆地区的区域文化样态，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往今来，内蒙古地区一向是中国北方各民族生息繁衍、世代传承、依存交融的共同家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生于斯长于斯的各族人民在你来我往、交错杂居中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北疆历史，创造了灿烂的北疆文化。而这一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客观史借由不同语言文字，载入史册、留存于世，成为当下北疆文化研究的珍贵史料。

由于戎、狄、匈奴等诸多中国古代北方游牧部族无本民族文字，故未产生直接记述其社会历史文化的本民族文字文献，而丰富的汉文史料就成为认识和了解这些游牧部族历史文化，以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主要渠道。

秦汉以来，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逐步形成以及边疆与中原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有关边疆与边民的知识亦日趋丰富。此时起，中原王朝史家们开始格外重视边疆民族史志的撰述，由此陆续产生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范曄的《后汉书》等在边疆民族史志记述方面颇有成就的早期通史或断代史史书。其中《史记》在撰写体例上开创了为边疆民族列传的先河，不仅记载了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历史，还以列传形式，记述了匈奴、朝鲜、大宛等北方、东北以及西域诸部族历史。其《匈奴列传》则成为今日研究古代中国北方匈奴历史文化最早的民族史志资料。《汉书》和《后汉书》继承《史记》撰写体例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和超越。前者除收录《史记·匈奴列传》旧文之外，又有大量的增补，从而将西汉时期中原

汉民族和北方匈奴民族关系史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来。后者则增设《南匈奴列传》《乌桓鲜卑列传》《东夷列传》等新的列传，表明东汉以及后续朝代的史家们对古代中国北部边疆地区部族分布情况及其相互间关系又有了新的认知。

北魏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部族拓跋鲜卑建立的封建王朝。其最初建都于盛乐，后依次迁都于平城和洛阳，成为终结纷乱的五胡十六国时代、统一黄河南北广大区域的多民族融合的政权。至北齐，时人魏收所纂《魏书》记述了北魏、东魏两个政权160余年的历史，亦是我国封建社会历朝“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不仅记述了以鲜卑为主体的多民族历史，还记载了周边蠕蠕、高车、契丹、高句丽、吐谷浑等边疆部族社会状况及其与中原王朝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是了解北魏时期民族融合的宝贵史料。

唐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周书》的纂修，认为唐朝基业承继自西魏—北周，将北周历史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继《魏书》之后，由唐初史官令狐德棻主纂的《周书》记载了北朝时期北周短暂的20余年的史事。《周书》同样继承前朝纪传体史书体例，不仅对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历史文化大书特书，且第一次将影响过欧亚大陆历史进程的古代突厥部族历史载入封建王朝“正史”叙事当中，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自东汉末年以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部族不断内徙与中原汉民族融合，促进了游牧与农耕文化的交融进程。唐初房玄龄等史家所修《晋书》专为五胡十六国创设“载记”，记述了十六国政权兴

衰更替历史，对研究五胡十六国时代中国古代北方地区民族史、民族关系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有回鹘、蒙古族、满族等一些少数民族创造了本民族文字，并留下了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文献，对研究各民族历史以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亦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公元9世纪中叶，西迁新疆建立高昌回鹘王国的回鹘人开始广泛使用以粟特文字母为基础创制的回鹘文，成为当时新疆、中亚地区通行的文字，至15—16世纪，回鹘文逐渐被察合台文取代，成为濒危文字。迄今为止，传世的回鹘文文献种类多样、内容广泛，既有元代汉文和回鹘文合璧《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元代六体文《居庸关石刻》等碑刻、石刻文献，又有明代汉文和回鹘文对照《高昌馆课》等公文集，以及回鹘文契约文献、回鹘文医学文献留存于世。这些文献是研究回鹘社会文化、回鹘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珍贵材料。

蒙古文字是借用回鹘文字母创制的拼音文字，元明时期（13—17世纪初期）的蒙古文字在其字符、笔画、书写规则上与回鹘文字非常相似，可称为“回鹘式蒙古文”（古代蒙古文）。元明两朝多用于官厅文书、牌符及各类碑文的撰写，并遗留有《孝经》等少量元代译刻本残页以及明代蒙古文和汉文合璧《华夷译语》、分类词汇书。其中，《华夷译语》是明代汉人学习蒙古语言文字而编的工具书，是汉蒙两族文化交流之有力证明。

元代另一种官方文字乃为参照藏文

和梵文字母创制的八思巴蒙古字，以此拼写蒙古语、汉语、回鹘语、藏语、梵语等多种语言，试图达到“译写一切文字”的目的。传世的八思巴蒙古字文献种类多样，主要有诏书、玉册、宣敕、禁约榜、牌符、印章、碑刻、墨书、题记、花押、钱币以及少量的图书和部分写本文献残页、残片等。其中，拼写汉语的八思巴蒙古字文献资料数量可观，是研究元代汉语音韵的必要资料。元亡以后，八思巴蒙古字逐渐被废弃。但在元代西藏，一种仿照八思巴蒙古字形，并专门记录藏语的八思巴蒙古字变形体一直沿用至近代，在清代一些蒙旗札萨克衙门蒙古文档案、寺院蒙古文档案文书中还可以找见此种衍生于八思巴蒙古字的变形体文字铭印，是研究藏文演化史、民族文化交流史的宝贵史料。

近年来，大量的清代及民国时期汉、蒙、满、藏文等多语种档案文献陆续得以整理出版，且基于档案文献的新研究成果亦不断涌现，继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北疆历史文化研究的繁荣发展。另外，近代以来形成的有关记载中国边疆的西游记、日文调查报告中亦保留了丰富的北疆历史文化资料，对于了解近代中国北部边疆地区民风、民俗有着极高的文献价值。这些历史文献均是当下推动北疆历史文化研究创新发展，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走深走实的史料支撑。



延安时期，由于国民党实行新闻封锁和歪曲宣传，延安犹如白色海洋中的一个红色孤岛，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真实情况知之甚少。其间，一批外国进步记者走进延安这座“红色之都”，用手中的笔和镜头，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他们以敏锐的目光，客观公正地向世界报道中国革命的真相，为地处偏僻、对外宣传资源匮乏的共产党“发声”，将“红色孤岛”的信息和红军将士的事迹传播到世界各地，让世界了解“红色中国”，瓦尔特·博斯哈德就是其中的一位。

瓦尔特·博斯哈德（1892—1975年），瑞士人，《新苏黎世报》《生活》《世界画报》记者，现代新闻摄影的先驱。他是第一位访问延安并见到毛泽东本人的欧洲记者，于1938年和1947年两次到延安和解放区采访，用镜头记录了当时的时代面貌和历史时刻，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影像资料，积累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新闻素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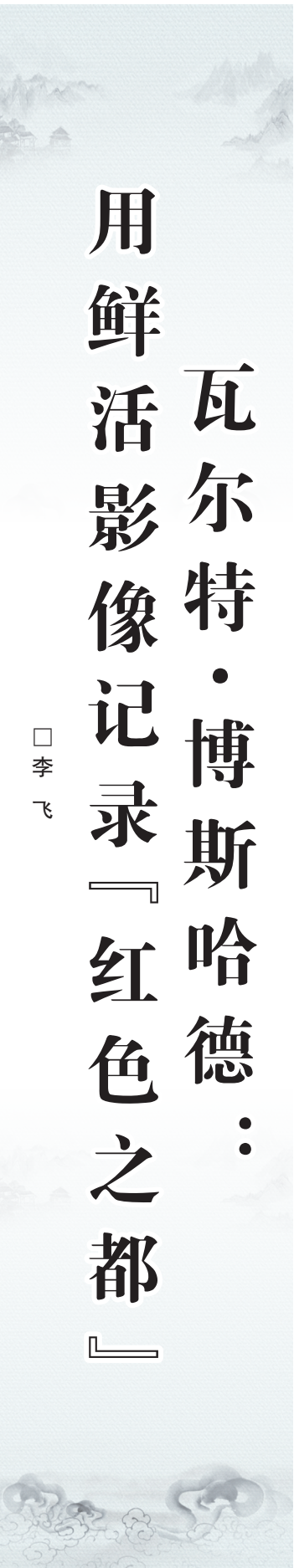
在延安看到中华民族的希望。1938年初，史沫特莱帮助博斯哈德在武汉的中共办事处见到周恩来，在周恩来的介绍下他顺利拜会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经林伯渠安排，博斯哈德随八路军运输物资的车队前往延安，开始了他的延安之行。

途中，满载货物的军用卡车颠簸在泥泞的山路上，旅途的艰辛险阻令人惊心动魄。汽车不时陷入泥泞之中，不得不用人力奋力帮助拉动汽车，一些路段几乎是一寸一寸挪步前行。博斯哈德感叹：“路况之差，使得我们只好缓慢前行。即使轮子上缠着铁链，也无法阻止汽车顺着陡峭的山坡向后滑。好几次，车队还得从万丈深渊上晃悠悠地经过，让人直捏一把冷汗。”博斯哈德用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拍摄了沿途风光和车队行程，真实记录了那个时代三原、宜君、洛川、甘泉等陕北小镇沿街的建筑风貌和风土人情。途中人们对红军的热情给博斯哈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车队一行人曾在一间农舍中过夜，主人把最好的房间腾给他们，房间的墙上用鲜红的纸写着“我们相信红军”，这份军民鱼水情让他非常感动。

博斯哈德回忆道：沿途的乡村越来越破败，然而我们越接近红色首都，就越能看到大量中国年轻人的身影，他们个个背着简单的行李徒步走到这里，希望加入梦寐以求的八路军，这是一条“朝圣”之路，延安就是下一代心目中的“麦加圣城”。这一代人在战火中背井离乡，在延安找到新的信仰归宿。他感慨道：“共产党点燃了许多中国青年希望，使他们纷纷涌向延安，主动接受革命教育。”虽然抗战时期的延安物质贫乏，但军民精神富足，延安以其独特的气质风采，吸引众多进步青年如潮水般涌向延安，奔向中华民族的希望和未来。

用镜头记录延安军民的生活。历经6天的艰苦旅程，博斯哈德终于抵达令他心驰神往的延安。他利用摄影机镜头真实地记录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拍摄了一部片长21分49秒、名为《延安之旅》的黑白无声纪录片，不仅记录了毛泽东走出窑洞与众人见面的实况，还记录了毛泽东工作生活场景的珍贵影像资料，同时将镜头对准了普通百姓和战士。博斯哈德拍摄了抗大、陕北公学和文艺学员们的学习和生活情景。他们在延河边洗漱，在院子里集体用餐，在晨光中上早操，在晚霞里散步、唱歌、打球……丰富多彩的生活，深深吸引着这位来自欧洲的访客。

博斯哈德详细真实地记录和呈现了延安风貌，有战士们光脚穿布鞋在操场上席地而坐学文化、端枪冲下山头训练的场景，也有“红小鬼”在训练间隙用书本当球拍打乒乓球、文艺学员在窑洞门口合唱《义勇军进行曲》的画面，还有老乡卖凉皮、泡馍的街头见闻。延安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人们居住在土窑洞内，机关、学校、医院也不例外，但街道干净整洁，大家穿着打补丁却干干净净的衣服，这里的生活看起来生机勃勃。博斯哈德发现，在共产党的根据地，人们最重视的是学习和教育，士兵们要不断学习、培养读写能力，在行军途中或者休息时，士兵们用手指头或尖尖的石子在沙土里练习写字，以完成一天的课业。红军用这种方式彻底扫除了文盲，每个士兵都能读懂报纸和简单的书籍或小册子。这里



□ 李 飞

用鲜活影像记录『红色之都』

还有许多大学高材生，说着流利的法语和英语，他们认为共产党是中国走向民族独立的希望，他们来到这里继续学业并相互交流，憧憬着民族的未来，为理想而奋斗。

毛泽东的智慧与自信让他终生难忘。在1938年访问延安期间，博斯哈德采访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在写《论持久战》，话题围绕中日战争的形势和趋势展开。在毛泽东看来，日本有三大弱点：兵力不足、军士残暴、指挥笨拙，正是这三点使他坚信中国终将胜利。

博斯哈德询问关于国共合作的前景，毛泽东提到，中国人民的团结一致高于一切，甚至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在当下都不是最重要的，国民党应该与共产党合作，一起抵抗侵略者，否则中国就没有未来，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希望，是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可以忽视的。

对毛泽东的访谈持续了近三个小时，毛泽东说话简洁有力，看问题深刻透彻，他敏锐的眼光、独到的见解和开门见山的谈话方式给博斯哈德留下深刻印象，毛泽东的智慧与自信让博斯哈德终生难忘。博斯哈德在采访记录稿中，评价毛泽东更像一位古典时期沉思的哲人。

博斯哈德的观察与报道，向国际社会呈现了中国共产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求真务实、廉洁自律的集体形象，以及倡导团结抗日、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主张，推动了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国际传播，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共舆论宣传战中的弱势地位。博斯哈德拍摄的影像资料，真实生动地讲述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隽永的回声。

